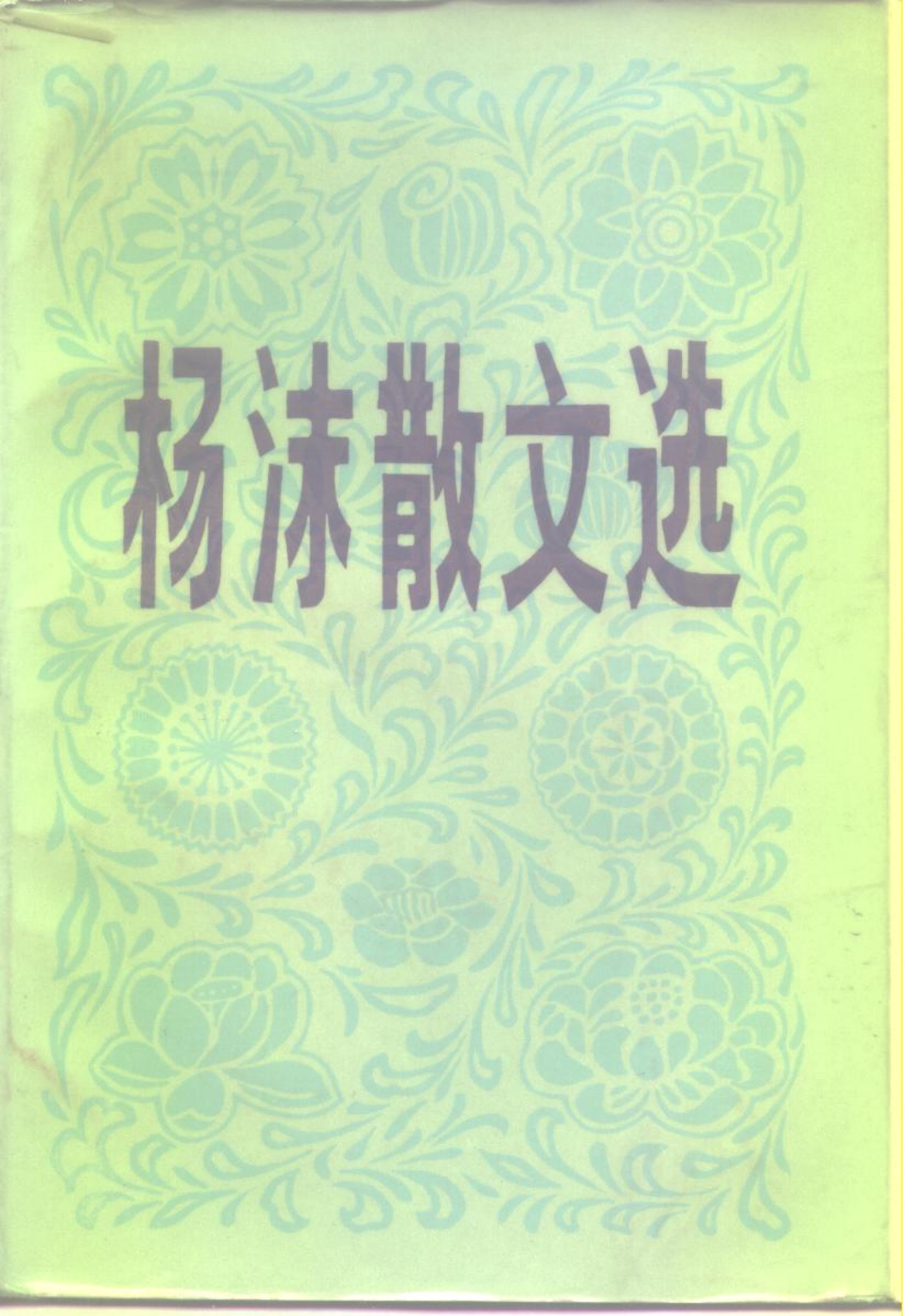




杨沫散文选

I267/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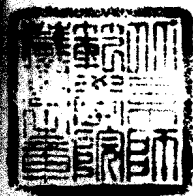
杨沫散文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0424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900424

杨沫散文选

责任编辑：高彬

装帧设计：曾东凡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10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次印刷

字数：224,000 印张：11 印数：18,201—35,500

统一书号：10109·1422 定价：(平装)1.05元 (简装)1.35元

目 录

我的生平	1
难忘的悠悠岁月	15
乡思的朝和暮	20
青春是美好的	32
乡 情	39
花 蕊	43
青春啊，永远发出绚烂的光彩吧	51
北京的灯光	55
北京沙滩的红楼	57
我爱北京	59
春城无处不飞花	64
终生的幸福 终生的怀念	67
欢乐与悲伤	71
深埋在心底的思念	75
怀 念	77
哀 念	82
碧海青天寄友情	85

伊藤克姐姐，我怀念您	90
永远难忘的友情	94
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环	100
天涯若比邻	104
和聂华苓重逢的日子	108
致阿拉伯读者	113
一封奇怪的信	116
写在八十年代第一春	118
我以是女人而骄傲	121
青春应当是鲜红的	127
白与黑	130
关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	142
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	144
回 忆	148
《回忆》小记	151
在后方医院	152
罪恶的见证	155
《罪恶的见证》小记	160
《在兵站上》小序	161
在兵站上	163
神秘的大苇塘	168
郑德富家俩口子	172
读了《四条腿的》之后	177
美国货的倾销与边区的妇女生产	180

我的生活与创作	182
世界观和创作	191
绝处逢生后的心声	194
创作体会点滴	197
深入生活 提高技巧	202
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	206
文艺创作的效果和职责	214
瘦马和长矛	221
我和书籍	226
创作的源泉	229
昔日童工唱出的歌儿	232
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	237
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	241
谈谈林道静的形象	250
献上一颗炽热的心	262
刻骨的感念	266
读者、作者间的深情	268
感激·喜悦·惭愧	274
改编《青春之歌》的体会	276
《青春之歌》和电影	279
向电影艺术探索	285
林道静的道路	288
让青春发出绚丽的光彩	295
《作者与读者》(一)	298
《作者与读者》(二)	304

我和《东方欲晓》	320
有彩线才能绣出花朵	324
《东方欲晓》二、三事	328
遥寄心声	335
血和泪的凝集	339

我的生平

两鬓斑白，年轻人已称呼我为老人了。但在这老人的胸膛里，依然有一颗年轻、炽热的心在跳动着。这颗心里，依然不停地发射着它的光和热。

好象松树上的年轮，在我的心上也不能不刻下时代的烙印；留下漫长生活的痕迹；打下战争风云的桩子……当我回首往事时，常有悲痛袭上心头；但更多地是欢快、是幸福、是献身革命而没有虚度年华的豪迈激情……

一九一四年的阴历七月初五日（公历八月二十五日），我诞生在北平一个名为“大学校长”又是前清举人的书香之家里。父亲以办教育为名，募了大批捐款，在热河（今河北省）滦平县买了满清王爷的大批土地。于是，父亲显赫起来。渐渐，由于从佃农身上榨取了大量的财富，父亲办的学校便徒有虚名。而花天酒地、嫖妓女、娶姨太太的腐朽生活，使他不顾家，使他堕落了。母亲开始还和他吵架，打跑了一个个姨太太。后来，她灰心了，不再管父亲，她自己也就成天和一些阔太太们打麻将、看戏、过起吃喝玩乐的寄生生活。由于对父亲的气愤，她也不再关心儿女。那时候，我有一个比我大十二岁的哥哥，由于家庭的腐败，父母的不合，还没上大学，他就离开家庭独自谋生走了。我呢，是最大的女儿，

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妹妹她们在两岁时还雇有奶妈带领，而我在五、六岁直到十二、三岁时的生活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在这家庭中，我象孤儿，没人照顾，没有温暖。每到黑夜我就恐怖得要命。因为我那时和母亲睡在一排很大的屋子里，夜晚，母亲时常找阔太太们出去打牌、看戏，就留下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独自呆在那些又大又阴暗的房间里。好恐怖，好吓人呀！有一次我从朦胧中醒来，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发现母亲刚刚出门。我吓得跳起身来，急忙追了出去：

“姆妈！姆妈！——姆妈呀！——”父母是湖南湘阴县人，管妈妈叫“姆妈”。我惊悸地大哭着追到了大门口外，母亲刚刚要坐上当时阔人们流行坐的马车，见我追到了她身边，想拦住不叫她走，“巴、巴”几个嘴巴，狠狠地打在我的小脸上。她瞪眼向我大吼：“滚回去睡！”我抚摸着被打红的小脸，流着满脸眼泪，眼巴巴地看着她坐上漂亮的马车走了——走远了。我才返身走过那又黑又大的院子，独自瑟缩在屋角里，含着泪水睡着了。那时候的恐怖悲哀的心情，象伤痕一样永远镂刻在我的心上，使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心酸。……

此后，她嫌我麻烦累赘，就把我送到舅父家里去寄养。舅父母孩子很多，我这个从小没有人抚爱的孩子，在这儿又常受表哥、表弟的欺侮。他常打我、骂我。把我象个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后来，我受不住了，我已经八岁，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母亲才把我接回家里。可是我的生活，这时依然不如阔人家里的一只小狗。我和家里的佣人同睡在一条炕上，混身长满了虱子，鞋袜破得露着脚后跟。每到冬天，脚上的冻疮流着脓血烂成了一个大大窟窿。下了学，家里呆着

没意思，我就满街乱跑，和拣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一起拣煤渣。……我虽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学校长，兼大地主的家庭里，父母也是我的亲生父母，可是我的童年却是悲惨的。这悲惨的缺乏抚爱和无人照顾的生活，却也养成了我的倔强、大胆、热情，厌憎并反抗父母那种腐朽堕落生活的性格。并且也和我后来一头钻在书堆里，从书本里去寻求安慰与快乐，从而爱好起文艺和正义事业的行动大有关系。

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还觉悲痛。它对我性格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我要把它记下来——一个深夜，我在保姆的炕上头朝里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疼痛疼醒了。原来母亲正在我的小腿上拧着，狠狠地咬着，大骂我把她一个心爱的花瓶送给了一个客人。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是她的一个熟人拿走了她的花瓶，保姆没敢拦。她回到家，发现花瓶没有了，问保姆，保姆怕挨骂，推到我身上——因为毕竟我还是个“大小姐”呀！于是，我就遭到了这场无辜的灾祸，……这时候，我已经有十岁左右了，已经对母亲的残忍、自私产生了憎恨、厌恶，甚至敌对的情感。不管她怎样拧我、咬我、骂我，我忍受着痛苦、委屈，从来都是既不哭、也不喊，更不求饶。我就是一声不哼地用沉默来反抗她。从小，我就养成了眼泪向肚里咽的忍耐性。也养成一种无言的深藏在心底的反抗性。

我在北京上小学读书也是时断时续的。因为母亲常要到群山环抱的滦平县去收租。她带着一帮帮她办事的人，也有时带着我。在这里，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

真实景象。她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炕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儿……这些悲惨的事实，活生生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后来一旦接触了马列主义，知道了什么是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些概念的意义时，我立刻就象海绵吸水一样，把它们吸收到我的血液中。我恨透了一切剥削阶级，我要革他们的命！

十四岁，我在北平西城福绥境小学读完高小一年级时——就是还差一年才高小毕业时，为了逃出那个使我厌恶的家庭，我考入了北平西山温泉女子中学的一年级，我住在学校里，傍依着北平郊区宁静幽美的山光水色。除了必须学习的一般功课，我把全副心灵都倾注在阅读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名著里。读书，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快乐，打下了以后我能够从事文学事业的基础。但是，那些书——尤其是郁达夫的小说和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却又撕裂开了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创伤——人生呵，你是多么黑暗！多么冷酷！多么肮脏！……我这纯洁的心灵可不愿在你的罗网里活下去，生存下去了……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我竟然憧憬起“死”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读到了初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还有一年多（那时是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二年。）我就可以初中毕业了。有一天，母亲突然把我从学校叫回家

里，对我说，家中破产了，父亲不管家逃得不知去向了。一句话，为了家中的生活，她给我找了一个小军阀，叫我嫁给这个人。我对这种生活极端厌恶。我受了十八世纪欧洲文艺的个性解放的影响，也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我要婚姻自主，怎肯听从她的摆布？我坚决拒绝了她的如意算盘。她勃然大怒。从此她断绝了对我的一切供给。

我勉强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读完了初中三年级。放了暑假我不得不回到家里，还幻想母亲会回心转意。谁知她逼迫、威胁我更甚了。这时，我就大胆逃出了家庭的牢笼，一个人偷跑到了北戴河，去找在那儿教书的兄嫂。同时，写了许多信托同学、朋友替我寻找职业。就在这等待“职业”的渺茫的日子里，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大海边，望着美丽辽阔的大海，我悲痛地想，天地这么大，怎么竟没有一个十七岁女孩子的立锥之地？对人生的绝望，我曾多少次想跳进大海去结束我年轻的生命……毕竟“生”的诱惑，我还是没有死。暑假快结束时，一个同学替我找到河北省香和县县立小学校教书的职位。我去教书了。

我刚教书不过两三个月，母亲病了，打听到我的下落，劝我回家，并答应以后还可以供我读书。当时，在我的思想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听到还可以读书的消息，我就赶快离开香河小学回到北平家中。可是，这时母亲已经病重，而且，父亲不知去向；哥哥也不肯回家；只剩下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妹妹守着贫穷垂危的母亲，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读书！不久母亲就因癌症死了。从此，我们的“家”也就散了。我的妹妹，那时只有十一岁就去投考了联华电影公司，当

起小演员，独自去谋生。我呢，在去香河教书时，认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的大学生，我们相爱着。在失学失业，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我只得和他同居了。我们住在沙滩的小公寓里，靠着他家中寄给他的小许钱来维持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使我感到窒息，感到空虚和苦闷。我喜欢读书，喜欢海阔天空地幻想，不甘心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只作个洗衣、做饭的妻子。这是一九三二年的事。到了一九三三年初的旧历除夕，我的生活突然有了转机——我去小妹妹住的公寓里和她共度除夕。在她那儿聚会了十几个东北流亡青年——多半是大学生或是党的外围组织“剧联”的人。这里有地下党员，有爱国的进步青年。象“青春之歌”里的白莉萍，就写的是当时和我妹妹同住一室的电影明星刘丽影。她当时还向我讲述过苏联妇女的解放生活。还有一些进步青年向我宣传抗日道理，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也有的介绍我看马列主义的书籍——我清晰地记得，我读第一本进步书籍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从此我空虚的心灵顿时充实起来了，我满眼漆黑看不到一点光明的眼睛突然明亮了。从此我如饥似渴地读起了我所能找到的一切革命书籍；也读起了高尔基的《母亲》和其他的苏联革命小说。我再也不想死，而是想活——活得有意义，活得让青春发出绚丽的光彩。……可是，我住的那间公寓小屋却越发使我感到窒闷了。我渴望飞——飞出爱情的牢笼，飞到广阔的自由的天地里去。因为那个大学生是个崇拜胡适的、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而我当时却获得了革命的理想，渴望做一个献身共产主义的

革命战士。从此，我们不断地争吵，一直吵到一九三六年，我找到了党，参加了党之后，便和这个大学生最后断绝了关系。

为了“自食其力”，又不愿做那个大学生的寄生虫，除了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香河县当过几个月的小学教师外，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我曾先后在北平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在定县铁路员工小学当过小学教师。一九三六年初，又第二次到香河县县立小学去当教师。我的职业时断时续这段生活是比较穷苦的。但我的心中已有了理想，有了希望，为了这理想和希望，我有时苦闷，有时又十分快活。在白色恐怖下，我不觉得恐惧，只是一个心眼找党。当时，白区党在王明错误路线领导下，已全部被破坏。我找不到党，就去监狱中看望被捕的同志。我听他们的话，在馒头中装上小铅条；把进步书刊包上伪装的书皮带给狱中的同志。当我偷偷地做着这些冒险的工作时，我好快活！我感到我渺小的生命，隔着那粗大的监狱铁栅，已经和伟大的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九三六年，当我第二次在香河教书时，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马建民同志。他是一个老党员。当时，因为一个和他住在一起的党员同志突然遇见叛徒而被捕，他就赶快逃离北平，跑到香河小学，投奔曾和他在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贾汇川同志，暂时隐蔽在这里。我认识他以后，非常高兴。他教育我，进一步启发我的革命觉悟；并叫我利用春假到北平去找地下组织了解情况。我听从他的分配，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才由他介绍参加了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大举进攻。当年我就和马建民一同参加了冀中区（河北省中部）的抗日游击战争。那时，我有个小女儿，还不满周岁，我正奶着她，我是多么爱她。但为了抗战工作，我却忍心扔下了她。我给她喂了最后一口奶离开她后，步行在乡村的土道上，走了从未走过的七十华里，傍黑天来到了安国县城。这个冬天的夜晚，疲乏，奶胀，想念失掉妈妈的孩子，我是多么地痛苦呵！多么想念我的宝贝女儿呀！我哭着几乎一夜没睡。但是，第二天，当我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以后，很快我就克服了个人的悲伤——忘掉了女儿，忘掉了个人的一切。

一九三八年底以前，日寇大举向正面战场进攻，敌后的冀中平原根据地还相对的稳定。战斗不多，二十多个县城由八路军占领着。开始，我担任安国县的妇救会主任，常常带着一群穿着旗袍、吹打着洋鼓洋号的女学生下乡，向农民宣传抗日。农民惊奇地望着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传教的。三八年底，敌人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回师敌后。平原根据地开始紧张起来了。三八年底，生了我的第一个儿子。当儿子刚刚满月，我又狠心扔了他，跟着来到冀中平原的贺龙将军的一二〇师，一夜夜地行军。战斗部队在前面打仗，我们群众团体，（我已在三八年五月调到冀中区妇救会担任宣传部长。）就在后面跟着部队跑——转战在辽阔的平原上。因为刚生过孩子，又连续在战斗中急行军，三九年初我就病了——发着高烧，几乎死去。后来在文安县王庄一个农民少妇王寿云的精心护理下，我渐渐好一些了。三九年五月我调到了大清河

的十分区，担任妇救会宣传部长。这里是靠近平、津、保的三角地带，环境更加残酷，战斗更加频繁。我带病工作，由于劳累，缺乏营养，我的黑热病又复发了。人骨瘦如柴，肚子却又大又硬，象石头块子，什么也吃不下去。组织上照顾我，曾叫我回北平去治病。我不肯去。我热爱大清河北这块燃烧着的土地，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离开它。后来，农民的一个偏方挽救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病有了转机。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组织上又送我到晋察冀边区的山区——易县一带的后方医院去养病，病又好了一些。这时，我曾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了几个月。因为我热爱文学，在战斗空隙，曾写过一些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等。联大成立了“妇女文艺创作会”，还叫我当了主任。

一九四一年后，曾被敌人践踏、蹂躏、环境异常艰苦的冀中平原，几乎全部变成了敌占区。到四三年时，工作稍稍恢复一些了，我又和许多战友，连夜越过一百多里的平汉路上的封锁线，回到了大清河北的十分区。因为靠近天津、北平和保定这些大城市，这里的环境依然碉堡林立，公路和封锁沟如蜘蛛网，异常残酷和紧张。就在这个时期，许多三两天前还和我在一起工作、谈笑的同志，三两天后。我就忽然听到他们已经牺牲了的消息……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他们牺牲的时候都不过二十多岁，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头——在我的心头矗立着一座座丰碑。现在，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了出来，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远记住这些为了今天美好的日子而英勇献身的同志——马敦来，他牺牲时不过二十岁，我们黎明报社的刻字员。（我四三年回到

十分区后，曾先后担任抗联会的宣传部长，黎明报社的编辑。）他刻得一笔好字，圆圆的脸总含着温和的笑。前一两天，我们还在一起，突然，听说他夜里走在住有敌人的村庄胡同里，碰上了敌人，一枪被敌人打死了。吕烽——坝县岔河集那个区的区委书记，我在四三年夏天曾到他那个区里和他一起配合工作。常常在夜间，他带着警卫员，也带着我，我们一起穿行在敌人的心脏里，然后找到群众开展工作……。在残酷的环境中，我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叫我“大姐”，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这是个多勇敢机智的小伙子呵！可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在新城县小芦管村的地道，被敌人大举破坏的战斗中，他英勇地牺牲了！……写到这儿，我忍不住泪如雨下——我不是用笔，而是用血、用泪在写我心上的英雄人物！我要一个个把他们从我的心上移到笔上——安适，一个从延安来的新华社记者，我们在平西根据地挺进报社里碰面了。因为他从延安来，我禁不住向他们打听延安的情况，打听毛主席……他很喜爱文艺，我们谈得来。有了空闲，我们一起谈各人的经历，谈写作。他是南方人，还有爱人在南方等他。很快，我们建立了同志的友谊。不过，日子不多，我就回到平原来。走前，他还送了我一本难得的精装的《联共党史》。也是在不久之后，我就听到他——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记者，在平西根据地牺牲了的消息。这是多么令人悲痛的消息呵！……还有那永远难忘的十分区敌工科长李守正同志，因为他也喜欢文学，我们碰了面总有许多话可说。当我在联大学习，生活十分艰苦，许多同学连衣服都没得穿时，我找到他，他曾为我向部队同志拣来了一些旧军装